

從一元到多元

——漢魏之際思想巨變鳥瞰

◎ 王曉毅

王國維說，學術變遷，莫劇於三國之際。大師所言極是。每當我在漢魏之際的殘編斷簡中神游時，儘管時差已有一千七百年之久，卻總是被當年發生的思想劇變所震撼。尤其是突發於曹魏正始年間的玄學革命，扭轉了兩漢經學幾百年形成的思想走向，開闢了從滯重到空靈、從一元到多元的新時代。

一元化的漢代經學

說及漢代思想的一元化模式，不由想起了去年的某次學術討論會。一青年學子大談漢代經學思潮的專制僵化時，另一在場的碩儒則嗤之，讓青年人回去讀《後漢書·戴憑傳》，說漢代經學亦有自由平等之學風，「奪席談經」，便是鐵證。我熟讀《後漢書》，仍對碩儒高論大惑不解。不錯，那位勇敢的少年才子戴憑，曾在經學辯論會上，因連續駁倒了五十名經師，連奪五十年席位，而以「談經奪席」聞名

於世，但是，那次辯論會有漢光武帝劉秀作總裁判。這種辯論與漢宣帝親臨的石渠閣會議和漢章帝御駕的白虎觀會議並無二致，蟻民嗡嗡吵鬧聲之上的那個「稱制臨決」的最後定音，恰恰表明了一元化思想控制的真實存在。

很奇怪，人們為漢王朝的統一和強大而津津樂道，卻對漢代經學思潮的專制和一統不屑一顧。這種心態，不過表明人類是一種由微妙感情控制的可笑動物而已。公平而論，漢代經學的歷史貢獻是不可磨滅的，它的一統，不僅鞏固了漢王朝的強盛和統一，而且加速了漢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形成和統一。但是，它也像一切事物都有輝煌和敗落的升降曲線那樣，難逃生、住、異、滅的輪回。自東漢中葉開始，經學思潮陷入了不可逆轉的危機之中，那些一度使之獲得活力的基因已經發生了致其於死地的癌變：細致流弊為煩瑣，注一經用百萬言，解釋五個字用二三萬言；神聖流弊為神秘，學術空氣中充滿了讖緯內

神聖的道德教化一旦與升官發財相聯，則很快會變成獲取功名利祿的工具。在仕途這根魔杖的指揮下，東漢帝國出現了求名的狂潮。

漢代一元化的思想模式，到北魏仍有一定影響，圖為北魏的屏風漆畫，文字和畫都強調儒家教義的孝道和道德。



學的妖氛。然而，導致經學思潮衰落的根本原因並不在上述理論層面，而在於政治實踐中的「名教之治」。所謂名教，是將儒家倫理範疇（名號）作為選官的標準，選拔因模範遵守倫理道德而獲得相應聲名的人物當官，以此教育誘導百姓遵守道德，達到天下大化（大治）。

可悲的是，神聖的道德教化一旦與升官發財相聯，則很快會變成獲取功名利祿的工具。在仕途這根魔杖的指揮下，東漢帝國出現了求名的狂潮。由於正常的道德操行已經難以出名，於是沽名釣譽之徒，紛紛做出不近情理的道德「壯舉」。如戴封外出遭強盜搶劫後，又將剩下的錢財追送強盜而成為著名的義士，被舉為「孝廉」。又如趙宣埋葬雙親後，不封閉墓道，住在墓道中，服喪達二十年，成了聞名的大孝子，卻在期間生了五個兒子。這表明，道德行為已成了發放政治高利貸，只為了一個極簡單、極明確的目標——欺世盜名而升官發財。

隨着名教之治的繼續惡化，充當偽名士已太費周折，不如以權勢疏通或金錢交易更簡捷。選官程序名義上是根據反映民眾意願的輿論，而實際上則是各級官員的意志，因為這種馬鈴薯式小農社會的輿論，在權勢面前從來都是毫無意義的空氣振動。對史書中關於「權門請托」及「賄賂公行」危言聳聽的記載，實在不必大驚小怪。比如：河南尹田歆的天良還未徹底泯滅，某次選舉時向其外甥、著名人材鑒識專家王湛求助說：「今年本地有六個孝廉名額，許多高級官員都遞上條子要求關照，我不敢違抗，五個名額走了後門，留下一個名額準備選一個真名士以報效國家，您為我物色一個吧！」清官尚且如此，贓官更可想而知了。這種腐敗風氣發展下去，自然就出現了歷史上著名的政治醜聞「西園賣官」，即政府將各級官職標價拍賣。顯而易見，道德教化反而成了摧毀道德良心的工具，名教之治已走了自我毀滅的道路。

漢代的異端和批判思潮

面對名教的破產，吏治的腐敗，和社會風氣的江河日下，官方經學思想的一統天下，在士族知識分子的心中，開始倒塌了。這一信仰危機的到來，早於社會的崩潰，它萌生於表面上仍平靜的東漢安、順之際。那時的中國思想界，已開始從各個方面尋找出路了，由古文經的轉盛、黃老文學的復興、道教的誕生，而至佛教譯經的發展，都可視為信仰危機的晴雨表，預示着未來思想變革風暴，即將來臨。

在萌生的各種「異端」思想中，道

家的「自然無為」起着主導作用。當時，針對名教造成的虛偽之風氣，許多士人反其道而行之，追求真率自然之情。這在服喪問題上表現得十分突出，汝南名士率先衝破傳統禮節。例如，薛勤在妻子死後，不悲不哭，而是效法莊子喪妻鼓缶而歌的豁達氣度，臨葬撫棺發表高論：「沒有夭折已經很幸運了，死了又有甚麼遺憾呢？」另一位以當代大禹孔子自居的戴良，表現得更為激進。母親死後，他吃肉喝酒，不按禮儀規定的時間場合哭泣，而是「哀至乃哭」，但卻因傷心而憔悴毀容。有人前來質問，這樣做是否合乎喪禮。戴良回答：「禮的本意是讓人表達哀情。如果哀情不喪失，就是合乎禮。如果內心真正悲哀，吃甚麼都會嘗不出滋味：既然嘗不出食品的滋味，那麼吃甚麼也都無關緊要了。」質問者啞口無言。當然，士族知識界的反抗並非局限於個人生活領域，而是轉向對社會的改造，逐漸匯集成反抗黑暗政治的漢末社會批判思潮，並最終外化為驚天動地的漢末清議——黨錮運動。

後期的東漢帝國，自安、順開始後一天天爛下去，到桓、靈之際，已經滿身膿血，奄奄一息地躺在治療台上，依靠輸血來維持生命了。國家機器除阻礙社會進步外，其它功能均紊亂不堪。漢末民謠說：「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挂壁。」當時，中等智力以上的人都已經看到其必死無疑的結局了。在這歷史大輪迴的前夕，整個社會的精神防線已經崩潰，絕望的世紀末情緒到處蔓延，上流社會醉生夢死，勞苦大眾則把自己未來的命運交給了太平道教的天師。面對深重的社會危機和精神危機，作為社會中堅力量的士族知識分子拍案而起，以

命相許了。

初次翻開《後漢書·黨錮列傳》往往驚於鮮血的淋漓，但讀得次數一多，也就習慣了。不過漢末清流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獻身精神總是使人激動不已。這些溫文爾雅的讀書人竟變得如此激烈，準備給這個病入膏肓的社會動一次大手術，然而，他們卻首先倒下了。這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王朝，它殺死了自己最優秀的人，也扼殺了自我更新的最後一線希望。汝南名士許子伯半夜起來號啕大哭，不是哭己，而是哭世。這是心死以前的大悲哀，也是熱到發冷的極熱情。既然宮廷已不再可能發出政治改良的詔書，那麼只能由太平道教主的密室發佈暴動的命令了。漢末黃巾大起義給了它致命的一擊，代之而起的是無休止的軍閥混戰，留下的，只能是關於社會總崩潰後一片血肉模糊的記載。

第二次百家爭鳴

漢末的長期戰亂使北中國變成了人間地獄，可以說，沒有誰在這場撕殺中獲得圓滿的勝利。儘管曹操在角逐中擊敗群雄而成了不稱皇帝的北方君主，但是他也為此而失去了父親兒子等二十多個親人。在作為新帝國的政治核心的建安名士集團中，幾乎沒有人未經歷過戰爭帶來的生離死別痛苦。這些苦難可以說是淵源於東漢王朝治國指導思想的失誤，新的統治者決不願重蹈覆轍，所以必須尋找新的理論武器。戲劇舞台上的假曹操是個白臉奸臣，而歷史舞台上的真曹操卻是個了不起的英雄，他不僅是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和詩人，而且是開一代文化風氣的思想家。他公開宣佈自

後期的東漢帝國，自安、順開始後一天天爛下去，到桓、靈之際，已經滿身膿血，奄奄一息。面對深重的社會危機和精神危機，作為社會中堅力量的士族知識分子拍案而起，以命相許了。

己「不信天命」，強調名實相符，連續三次發佈反儒家道德傳統的「求賢令」，即新的選官標準，明確表示即使不忠不孝，只要有真才實學，有經邦治國的能力，都要唯才是舉。另外，他還立遺囑要求薄葬，讓妻妾瓜分剩下的衣物，並迅速改嫁他人等等。這些舉動在現代算不了甚麼，在當時確有震聾發聵的作用。然而，曹操及建安名士畢竟是從漢末走來的，屬於漢末社會批判思潮歷史遺囑的執行者，其使命在於破壞舊傳統，而新的思想建樹，則是由他們的子弟——正始名士完成的。

首先跳上思想舞台表演的，是那位沒能活到正始時期便夭折了的「正始名士」荀彧。潁川荀氏家族世代以儒術著稱，而荀彧則以思想叛徒面目出現，以老子的信徒自居，喜歡發表駭人聽聞的言論。他指出，六經沒有達到聖人的微言大義，是聖人思想的「糠粃」。同時又攻擊儒教關於婦女價值的「四德」說，宣揚「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並娶了曹洪的漂亮女兒，以示表裏一致。後來妻子病亡，荀彧「不哭而神傷」。前來弔喪的傅嘏開導他說：「你一貫主張女人只要漂亮就行，而漂亮女人甚多，為甚麼這樣悲傷？」這位自稱好色而實際甚重感情的口頭革新家，最後竟因悲傷過度於喪妻後一年死去了。每當社會大變動時期，總會出現一些欲改門窗卻揚言拆屋頂的貌似激進的人物，正始名士大都是這類人物，只是荀彧更典型罷了。

這場劃時代思想革命的倡導者，是曹操那位體弱多病、膽怯多疑、靠吃「寒食散」來煥發生命活力的養子何晏。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玄學理論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王弼，竟是一位

年僅二十三歲就英年早逝的年輕人。這位少年才子以他不可思議的智慧，刷新對了《周易》、《論語》、《老子》三本影響中國歷史最大的儒道經典的詮釋，構建了一座令人驚嘆的思想大廈，成為這一時期哲學史上無法迴避的學術重鎮。

正始玄風的精神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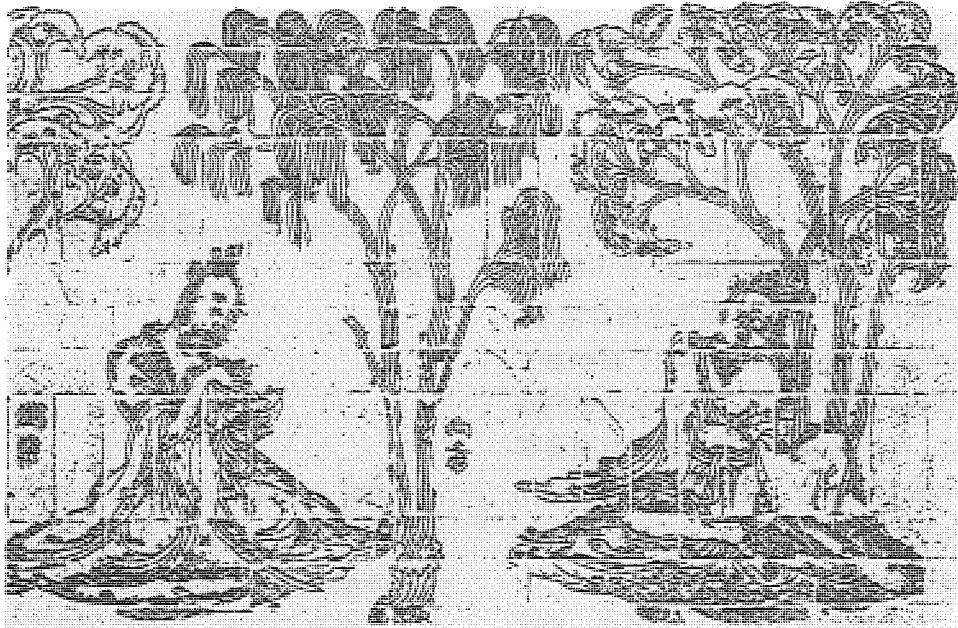
從總體上看，正始玄風的歷史價值，主要表現在新的學術風尚方面：自由清談、辨名析理、得意忘言等新的學術交流方式、新的學術眼光，將中國文化引入了一個嶄新的思想時代。

其一 清談論辯，學術平等

所謂清談，就是知識分子辯論會，類似現代的學術沙龍。人們往往以為清談是無聊的空談，其實這是誤解。早期清談基本上圍繞重要理論課題展開，以求理為目的，同時也獲得一種悟「道」的理智性認識愉快。大概就是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式的快樂。有人將清談看作玄學的同義詞，這種看法是不確切的，清談只是一種學術交流形式，不同觀點流派的人，都可以在這種辯論會上展開思想交鋒。眾所周知，漢代經學有嚴格的師承關係和森嚴的家法師法，表現出較強的人身依附關係，而清談則打破了這種沉悶的學術風氣。在清談場上，學者們享受了中世紀所能得到的最大思想自由。平等辯論，以理取勝，是清談的最重要特點。

在這種中國古代的學術「沙龍」中，大官與小官、官員與平民、長者與幼者之間的等級差異，一一消失

正始玄風的歷史價值主要表現在新的學術風尚方面：自由清談、辨名析理、得意忘言等新的學術交流方式、新的學術眼光，將中國文化引入了一個新的思想時代。



正始玄風的興起，把中國文化引入了一個嶄新的思想時代。

了，每個人都成了人格平等的辯論人，唯一能表明其自身價值的東西，只有「理論水平」這種精神財富。在那裏，沒有來自官方的政治干涉或武斷裁決，也沒有學閥作風或論資排輩的習慣：在那裏，理論是多樣的，而檢驗理論的標準只有一個，即聽眾的理性。天才少年王弼之所以能脫穎而出，獨步於思想論壇，就與此有關。年近四十的吏部尚書何晏，是清談的大宗師，已經注釋了《老子》，但在清談中發現了年僅十幾歲的王弼解釋《老子》的水平勝過自己，就放棄了自己的觀點，而對王弼大力推舉，使王弼迅速成名。

平等競爭的學術環境對新思想的產生和發展至關重要。無論甚麼學說，只要它能對當時的哲學課題作出深刻的回答，在清談中取勝，都會得到學術界的認可而大行於世。佛教之所以在這個時期滲入中國文化，逐漸取代玄學，奧秘即在於此。

其二 邏輯論證，崇尚理性

漢代經學注重聲名而不重實際，所以自漢末社會批判思潮到曹操，都

強調名實相符，注重名理學的運用和研究。王弼將名理學方法運用於新哲學的創建，對爾後的思維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名理學要求人們從客觀事物實際出發去認識真理，並在經驗和常識基礎上按形式邏輯規則進行歸納推理，表現為清醒的理性主義，無論甚麼理論，無論是聖賢定論或歷史記載，都要接受理性的檢驗，這與經學方法所具有的那種唯上、唯書的盲從態度形成了鮮明對照。例如，史書上載有不怕火燒的燒火布（石棉布），曹丕堅決不信，專門寫了文章駁斥，因為常識和理性告訴他，布是經不住火燒的。這文章由其子魏明帝刻在石碑上以示「不刊之論」，不料西域來使，貢上燒火布，隨後悄悄搬掉的石碑成了人們的笑柄。儘管曹丕錯了，卻反映出他不信傳聞的思想方法。又如《晉書·阮瞻傳》說，阮瞻曾與扮為人的「鬼」辯論。阮瞻運用邏輯推論「聊談名理」，證明世間無鬼，竟然使「鬼」理屈詞窮，只得現原形以證明鬼的存在。此文雖係神話，卻體現了不迷信前人定論的理性精神。不僅玄學表現為理性，即使這一時期的佛教和

道教，也是以經驗加邏輯的理性方法證明其宗教教義的。

其三 言不盡意，自由解經

言指語言，意指語言表達的思想。《周易·繫辭》曾提出「言不盡意」的說法，指語言不能完全表達思想。《莊子》也提倡「得意忘言」，指領會了思想實質便可以忘掉表達思想的語言。這些語錄在漢魏之際的思想變革中被重新發現，並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容，上升到了一般方法論的高度去重新認識。

漢儒將儒家經典奉若神明，認為它們完全表達了聖人的思想，句句是真理。當時，漢代經學的破產並沒有動搖儒家聖人及經典的地位，中國思想界還不可能繞開六經前進。因此，正始玄學的創始人在建立新學說時，迫切需要一種新方法重新解釋儒家經典，在注釋過程中輸入自己儒道融合的玄學新義，這也是中國古代新學誕生的一般規律。因此，「言不盡意」的學術方法應運而生。

王弼認為，儒道經典都沒有完全表達聖賢的思想，都是「言不盡意」的。那些經典中蘊而未出的真知灼見，需要人們「得意忘言」地重新開掘。不必拘泥於經典的個別詞句，而是要透過詞句去領會精神實質。由此可見，這實際上涉及了甚麼是真理及獲得真理的途徑等重大理論問題。顯然，六經因為沒有表達聖人最重要的「微言大義」，而不再是真理本身。新思潮終於搬掉了思想解放道路上的攔路巨石，立於難以被傳統派擊倒的地位。這是一個革命性的思想突破，自此開始，不僅玄學家們以它為武器，勢如破竹地發動了一場經學革命，掃除了漢儒牽強附會的舊文風和舊思

想，重新解釋儒道經典，而且，各種學術流派在發揮自己新思想時，無不高舉「得意忘言」的旗幟。比如佛教就是運用了這個方法，並結合佛教的真諦俗諦說和方便說，使佛教教義日益中國化。

結語

總之，突發於正始年間的這場思想變革意義重大，開拓了不斷探索真理的廣闊空間，創造了良好的學術環境。史實也是如此，在這種新學風的影響下，在漢代獨尊儒術大一統局面下沉寂幾百年的各種學術流派又重新復蘇，形成了中國古代第二次思想解放浪潮。除了儒家、道家、法家、術家等常見流派外，還有自稱為縱橫家繼承人的劉陶、用公孫龍語言辯論「白馬非馬」的愛俞和作《墨辯注》的新墨家魯勝等。熔儒道於一爐的玄學脫穎而出，風靡了思想界成為魏晉時代主潮。漢末被鎮壓的太平道與五斗米道逐步演變為神仙道教，在思想界的地位日益重要。尤其是來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以不可遏制的勢頭迅速發展，如同千手觀音，隨着各個時代的不同思想需要而多姿多態，獲得了中國士大夫的文化認同。顯然，自由多元的文化氛圍，迎來了新的「百家爭鳴」。

王曉毅 歷史學博士，山東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漢代經學的破產並沒有動搖儒家聖人及經典的地位，中國思想界還不可能繞開六經前進。正始玄學的創始人在建立新學說時，迫切需要一種新方法重新解釋儒家經典，因此，「言不盡意」的學術方法應運而生。